

克里斯托弗·伯特伦等著

80年代 苏联力量的前景

世界知识出版社

八十年代苏联力量的前景

克里斯托弗·伯特伦等著

星 灿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年·北京

ADELPHI PAPERS No. 151, 152

Prospects of Soviet Power in the 1980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London, 1979

根据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九年英文版
《文丛》第一五一、一五二期译出

八十年代苏联力量的前景

〔英〕克里斯托弗·伯特伦等著

星 灿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6 字数：118,000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10,000

书号：17003·1002 定价：0.48元

封面设计：孙 政

目 录

引 言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克里斯托弗·伯特伦 (1)
苏联看美国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	亚历山大·达林 (10)
苏联看西欧	前法国外交部文化、科学与技术司司长	让·拉卢瓦 (29)
苏联力量的源泉：经济、人口和资源	巴黎国际调查与新闻研究中心	乔治·索科洛夫 (46)
意识形态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伦敦《考察》季刊主编	利奥波德·拉贝兹 (60)
八十年代国际体系中的苏联	伦敦大学国际关系高级讲师	菲利普·温泽 (79)
苏联力量的源泉：八十年代的军事潜力	美国国防部纯估计局局长	安德鲁·马歇尔 (100)
八十年代苏联的安全考虑	华盛顿乔治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威廉·海兰 (115)
苏联国防政策方面的决策过程	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系	戴维·霍洛韦 (127)
领导集团的进身途径	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教授	约翰·埃里克森 (143)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力量和政策：非洲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 威廉·格里菲思 (154)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力量和政策：中东

.....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苏联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加利亚·戈兰 (170)

引 言

克里斯托弗·伯特伦

对苏联政策的性质和苏联所作所为的合理性进行任何探讨都是冒险的事，即使只是因为这种探讨免不了要受道德上和感情上的基本判断的影响。苏联是这样一个主体，不是惹人气恼，就是至少使人感到不舒服；它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价值标准不同，常常截然相反。因此，西方国家在辩论中政治意见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和使人迷惑不解的，特别是在原则问题上被认为是根本的意见分歧，在涉及实际政策时通常就化为次要分歧。或许正是很小的分歧使辩论激烈起来；由于没有基本分歧，次要的分歧能够导致激烈的争论。苏联的力量的性质很长时期来一直是西方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以致不再能对它进行冷静的分析。它决定我们的思维并继续规定我们所关注的内容。而且，苏联的政策及其保密性趋向于鼓励悲观情绪，有时使人们感到惊恐而不是使人感到有信心。

然而，当我们就要迈进八十年代的时候，也许现在比以前更有必要正确地观察苏联的力量，强点和弱点，及其野心和政策。在美国具有公认的战略优势和国际主义决心的时候，同苏联的力量相处是一码事，但是，当苏联在军事力量的大部分主要指示数字方面取得了均势，美国的军事努力由于必须对

迫切的国内问题让步而受到阻碍的时候，同苏联的力量相处却是另一码事；在北半球，在人们熟悉的、规定得比较明确的东西方关系界限（北约、华约、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欧洲安全会议）以内通过缓和和威慑来谋求安全是一码事，但是，当双方的争夺扩展到南半球资源丰富但具有爆炸性的地区时，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国际战略研究所才把下面一点作为一九七八年九月在牛津举行的第二十届年会的主题：从苏联的角度来探讨苏联的利益和力量。《文丛》第一百五十一期和第一百五十二期上发表的报告曾提交给年会讨论，并根据年会辩论的情况作了修改。这些报告的目的是为认识和对付八十年代这个重大的国际安全问题提供基础。

对苏联力量的限制

这些报告的主要贡献可能在于，所有报告都谈到苏联力量受到的限制。苏联领导人在八十年代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的清单实在是太长了。乔治·索科洛夫分析了苏联经济增长的停滞；分析了苏联人口增长的停滞；分析了使得生产率看来不会得到提高的一种经济体制的局限性。预计苏联由于石油和能源出口减少，赚得的硬通货将减少，这将使苏联支付从外国进口昂贵的商品的能力受到限制。报告对于苏联在中东和第三世界其它地区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提出了疑问，并正确地观察了苏联缓和政策的成就。中国和欧洲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受到重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的脆弱性也得到了强调。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的记录决不可以称作苏联对外政策的彻底胜利。下一代苏联领导人面临的问题的确是可

怕的：如何在保持大量军费开支的同时满足消费需求；在俄罗斯族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目前驻扎在欧洲和远东的军队；如何使东欧保持平静同时又减少东欧对西方信贷和资源的依赖程度；如何满足苏联国内许多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要求；如何使新的专家治国论者要提高效率的愿望同党的机构效率差的情况协调起来。

不管未来的苏联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多么可怕，看来这些问题不会使苏联的政策发生任何重大改变。连续性仍然是口号：这种连续性将表现在民族主义的甚至是沙文主义的领导中，然而其政策将是谨慎的，不准备冒无法估计的风险，而且继续依靠军事实力，期望能够对付来自内部的压力，并在外部增进苏联的利益。从西方的观点看也许是关系重大的问题，从苏联的观点看可能就不那么令人不安。极权主义政权的本性就是，它们能够用过去的成就，而不是（像我们的不耐烦的民主国家那样）用对付目前和未来的挑战的能力来衡量他们的成绩。

的确，要想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处理，不仅在实际政治中需要灵活性，而且在苏联意识形态中也需要灵活性。迄今为止的趋势是走向更大程度的僵化、厌恶改革和不鼓励采取新的态度。但是，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有一种物力论的成份，所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可能是由于要求改革的压力不足。用比较实用主义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家们将设法避免危险的僵持局面，并且不允许意识形态阻挡他们的道路，如果他们感到没有其它办法的话——就象所有的抽象概念那样，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也是适合于重新加以解释和重新加以证明的。

不肯定的推测

在此基础上，似乎有可能预言苏联国内以及在东欧的目标、军事计划和内部控制方面将会有连续性。的确，在国际政治中这样打赌是保险的：事情将会改变，但改变的规模不会那样大；苏联通过给它的臣民灌输（必要时用武力灌输）屈服和顺从思想来控制内部不安压力的传统能力，应会使苏联政权现在的结构和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持久性。但是，这些预言的准确性取决于作出预言时所根据的各个因素的可靠性。人们必须小心地选择正确的因素。正如威廉·海兰所说的那样，苏联在欧洲以及在苏美战略力量对比的某些方面的军事优势的连续性根本不是有保障的；或许到八十年代后半期，当西方武库中增加了新的武器系统时，苏联将会丧失这种军事优势。苏联人民当中不断出现的高涨的消费期望很可能会限制任何未来政府的灵活性。苏联日益增多的经济问题对国内行为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虽然现在还很难预计这种影响是否可能或多或少适合自由价值标准和西方利益。

尽管如此，看来八十年代不大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安德鲁·马歇尔推测，今后几年里，东西方之间可能出现蓄意的重大对抗，其规模与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相似。但是，很难想像未来的苏联领导人（即使他们不会象现领导人那样为对伟大卫国战争的记忆所吓住）会愿意冒此举所包含的巨大风险。况且，苏联领导人还有别的办法转移人们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并获得政治声誉。

苏联可能渐渐了解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可预见性的好处，

但是，它可能是有选择的——让·拉卢瓦说在欧洲表现可预见性，加利亚·戈兰则说或许在中东表现可预见性。但是，这并不表明西方对现状的看法已被普遍接受——的确，鉴于苏联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世界富有爆炸性的地区（从南非到波斯湾）的稳定是靠不住的，苏联承认这种杂乱无章的体系会有什么好处呢？

军事成分

军事力量是苏联政策的主要工具，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的说法，不过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军事力量在不断变化着的“力量对比”中只不过是一种因素罢了。但是，没有什么疑问，军事力量在苏联关于什么东西构成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定义方面已取得越来越大的比重。苏联是因为其军事实力而被视为一个大国的，这一定既影响苏联对于它应得到的地位的看法，又影响其它国家在涉及自己为取得安全而作的努力时对苏联的军事力量的看法。苏联文献正在越来越重视军事力量，没有人预期这一点所表明了对军事力量的强调会全面减弱。经济上的限制虽然是不可避免的，却不会大得足以扭转目前这种趋势；目前和将来的领导集团的态度可能会赞成有一个强大的军事态势，苏联军方将能够指出世界很不安全，以证明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同样能够指出其它国家由于受到苏联加强军事力量的刺激而进行的军事努力，来证明他们的要求有理。此外，正象戴维·霍洛韦的报告所表明，对于苏联领导集团来说，要克服支持这种趋势的军事官僚集团的惯性是不容易的。

但是，有迹象表明，在强调军事力量方面有具体的变化。安德鲁·马歇尔认为，苏联在继续发展把军事力量投入遥远危机地区的能力方面有重要的变化。苏联将把中国视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威廉·海兰认为，苏联领导集团可能情不自禁要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不是想征服中国，而是想使中国蒙受屈辱。海兰对于“霸权主义者”将进攻什么地方的估计与中国人的估计有明显的不同，他认为，苏联人可能会愿意考虑在欧洲进行有限的军事上的脱离接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可以把军事力量转向东方。

的确，中国在八十年代可能成为苏联在安全方面最直接感到担心的国家，特别是如果中国用从西方得到的现代武器技术装备起来的话。但是，中国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对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的苏联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苏联为什么象菲利普·温泽所认为的那样，“不再害怕”它的主要军事对手、高度武装的并且高度发达的美国，而对于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落后的中国却似乎有深切的不安全感觉，要解释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苏联由于它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取得的成功而受到鼓励，西方由于它与白人统治的南非的关系而仍然被束缚住手脚这一点也使苏联受到鼓励，因此，它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非洲，可能会越来越活跃。这些成就不仅仅是因时机好而取得的成就，而是反映了苏联的比较基本的态度——处于劣势者对第三世界的声援，以及主张变革的思想倾向。然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苏联在自己的边界以外面临着强大的邻国，在自己边界以内面临着进行控制的重大问题，对于

苏联来说，第三世界在战略上占有多大的重要地位呢？

流行的一致看法是，苏联没有“全面的计划”，而是搞机会主义。这种看法并不会使我们在对轻重缓急进行估计方面取得什么进展。十九世纪的英国对印度的控制是全面计划的结果还是机会主义的结果，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亚历山大·达林说得很好，欲望和冒险是有区别的。机会主义作为苏联行动的推动力量并不反映战略上的轻重缓急，而是反映出苏联准备占便宜，如果风险不大的话。迄今为止，苏联在非洲的卷入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将来也是这样么？加利亚·戈兰争论说，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中东，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得到解决而不是目前紧张局势继续下去，会非常有利于苏联达到其目的，虽然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形势可能会提供很多“机会”。

苏联对第三世界处于优先地位的战略考虑是什么？最有道理的分析应该从苏联当前在安全方面的关注开始。这种关注沿苏联国土的整个边界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苏联要在它的边界周围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的传统目标将来会被另外一种已经看得见的关注所加强，这就是对苏联国内的少数民族以及对他们和他们在边界以外的亲属的联系的关注。首先，部族亲缘关系以及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使得苏联有机会施加其影响；但是，如果在分所谓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地区的“教权主义”和反对现代化的新浪潮涌到苏联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的的话，那会怎么样呢？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和国外的民族觉醒可能会有一种越来越密切的联系。问一问苏联能为第三世界做些什么，与问一问第三世界能为苏联做些什么

一样重要。

在苏联的范围(苏联会把这个范围讲得相当大)之外,很难发现苏联处于优先地位的战略考虑,而不是可以利用的机会不多。如果将来人们很清楚地看到苏联把力量用于第三世界,这恰恰是因为这是一个有机可乘的地区,而不是说苏联在这个地区有处于优先地位的战略考虑。但是在这个地区可能形成对东西方全面力量对比的看法。可是,就象菲利普·温泽所警告的那样,如果认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主要是试探一下它能干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受到谴责,那就太简单了。昔日的革命力量在有选择的国际稳定中有着越来越大的利害关系,并且它越来越冒着被第三世界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危险,因此,它非常渴望搞清楚美国想要干什么。苏联一再抱怨美国的“之字形”的多变的政策,并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府制度中看来是无法估计的因素感到迷惑,这反映出苏联想得到某种可靠的国际行为规范,苏联可以据此来衡量它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但是,对苏联力量的限制,最初不大会在它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中为人们所感到,甚至不会在它与美国的竞争中为人们所感到。它们将在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不容易阻止外部影响的地区——东欧——为人们所感到。的确,很难避免作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力量在八十年代的局限性将在东欧暴露出来。经济限制因素、一个更富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领导集团和一个新的正统的意识形态这三者的结合,是危险的结合。它意味着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象征着西方的缓和和威慑的这个地区——欧洲有发生冲突的严重可能性。

苏联在八十年代将面临的问题不会使西方感到什么安慰。此外,相对地说,西方的政策对于这些问题也是无能为力的——或许只是能使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坚定性、连续性和一贯性,从而让苏联领导人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政策的内在的危险性以及进行合作的好处。

但是,几乎不管是谁在华盛顿当总统,或者谁在莫斯科当主席,这种一贯性将是难以达到的。安全正在变得——对于西方和对于东方来说都一样——越来越散了。得到外部保护、安全地取得原料和优先处理国内问题,不会使东西方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主要忧虑关切消失。但是,这一关切将是八十年代安全要求的一部分,人们不能很容易地把这些安全要求放到一项前后一致的政策中去。由于八十年代国际体系趋于支离破碎,我们也会经历安全目的和政策上的零打碎敲。毫无疑问,这种支离破碎会使苏联有机会扩展它的力量,也会减少对它的刺激,这种刺激本来会使它从它过去具有的“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的本能”,向着比较有信心地和负责地参与寻求国际秩序的方向前进。然而这一点仍应是西方的长远目的。苏联问题是不会消失的;我们将不得不和它共处。所以,在八十年代这个变化不定的时期,我们最好保持在过去二十年中所培植起来的东西方对话结构——不管它是多么不完善。

苏联看美国

亚历山大·达林

苏联对美国的看法历来是模糊的。美国既是羡慕的对象，又是蔑视的对象；既是要斗争、揭露并揪出示众的敌人，又是应仿效、赶超的楷模。出现这种模糊的看法是有多种原因的，而这些原因又互相影响。有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更远的时候就有的俄国传统看法，还有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思想的影响，他们无可奈何地赞赏象匹兹堡和底特律这样一些工业效率的象征，同时又认为美国资本应对从大萧条时期一直到今天的跨国公司时代世界经济出现的危机和弊病负责。在斯大林时代，莫斯科的许多态度是由于苏联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加上对美国情况的一无所知所形成的。也必须承认，美国生活和行动的现实往往证实和加强了这些不明确的想法：不管苏联的看法多么不正确，美国在俄国革命后的确进行过干涉，美苏也的确曾结成盟国反对纳粹德国；认为美国富足和认为美国可悲这两种看法都是有根据的；既有五角大楼，又有民粹主义；有乐观主义和机会，还有种族主义以及以米老鼠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①为象征的肤浅的大众文化。

然而，要明确指出苏联对美国的看法，那是很难的。这不

^① 美国著名流行歌手。——译者

仅是由于在他们对于自己基本上不了解也不信任的制度和社会的看法中同时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因素——例如羡慕与恐惧——而且还由于在苏联政治上层人士中对美国存在着不同的印象、看法、假设以及政策上的偏颇——而在思想上对这个对手的每套看法都会产生一套相应的态度。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对苏联摒弃由“国家”（或者“党”）所代表的单一的、有理性的角色的模式，就象我们已对西方所做的那样。即使苏联的看法的范围不象西方国家的看法那么广泛，但人们也能够证明苏联观察家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很大的，往往是连贯的，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理所当然地适应并提供各自不同的、相当连贯的世界看法和政治侧重点。

互相矛盾的形象

只要仔细看一下公开声明和出版物，就会看出苏联对美国至少有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和论点（有些分析家会说还不止两种）。称一种看法是温和的现实看法，称另一种看法是顽固的敌对看法，这虽嫌过分简单化，但并不是很不公平的；前一种看法可能是重实务的看法，后一种看法可能是教条主义的看法。

奇怪的是，对于这两种看法以及因这两种看法而产生的政策，人们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人们还可以证明（例如，象富兰克林·格里菲思所证明的那样），由两种看法帮助形成的观点和分析中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贯性。如果说，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当真认为战时盟国在大战结束时必须继续合作下去，并相信盟国能够继续合作下去，那么，象

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等人，却认为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的最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久，正统的斯大林分子谴责了苏联的一些经济学家（叶夫根尼·瓦尔加或许是最有名的一个），因为他们开始争辩说，美国政府的调节和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助于缓和私人企业的压力，还说，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预示着美国生活水平会大大提高。这些预言使其作者被怀疑对资本主义温情脉脉。在斯大林主义后期的年代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正如弗雷德里克·C·巴洪等人在当时用文件所证明的）越来越象一种讽刺画，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生活的报道干脆被称作是一场无边无际的争斗中的“武器”。

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年代里发生的根本变化。国际关系和对外领域的研究工作活跃起来了，对核战争和威慑的看法不断变化，结束了自我孤立状态，逐渐出现了新的一批苏联分析家和顾问，这些人虽有种种缺陷，但越来越博学，越来越有影响。威廉·齐默尔曼和其他一些人曾仔细地探索和研究了这些趋向。不用说，要改掉可以预见得到的教条主义、利己的歪曲报道和虚伪的乐观主义等习惯，是需要时间的，停止报道据认为是老板想听的东西，也是需要时间的。

与此同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发现求助于列宁的一个老公式倒很方便：有“两种倾向”在西方社会（现在特别是在美国社会）中起作用。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莫斯科经常求助于这种思想：美国存在着为争得支持而相互竞争的两种（对苏联以及对其他问题领域的）互相矛盾的态度。由于美国国内的